

责任状也要去“库存”挤“水分”

刘良恒

有些部门把责任状当成了“万能药方”，以为只要责任状一签，什么工作都能落实到位，却没有考虑基层到底有没有能力和办法去落实

状到底能不能落到实处，他们心里其实也很没底，“反正只要不出事就行了”。

客观来说，责任状本身并无问题。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手段，上下级就某项工作签订责任状，上级将工作任务布置给下级，下级承诺全力完成工作目标，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责任分解、压力传导的目的。这相当于，下级给上级立了“军令状”，上级给下级上了“紧箍咒”。由此来看，上下级签订责任状的初衷是好的，如果运用得好，效果应该也不错。

那为什么现在一讲起责任状，就会引得基层怨声载道、叫苦不迭？不少乡镇干部大倒苦水，讲出了他们心中的苦闷和无奈。现在最大问题是责任状“满天飞”，让基层工作人员像“无头苍蝇”一样到处乱撞，干工作“眉毛胡子一把抓”，疲于应付上级的各种检查、考核以及材料报送工作。有些上级部门把责任状当成了“万能药方”，以为只要责任状一签，什么工作都能落实到位，却没有考

虑基层到底有没有能力、有没有办法落实责任。

不少乡镇干部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一些上级部门热衷与下级签订责任状，实际上是一种“甩包袱”的官僚作风，习惯了当“甩手掌柜”。这种路径依赖背后的逻辑是，工作我已经布置下去了，责任目标我也已经分解了。至于能不能落实责任，或者采取什么方式完成任务，那是你的事情，我管不着。如果不出事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；要是出了事，对不起，我就拿你是问。最终结果是，基层为了完成任务，不惜浮夸虚报、弄虚作假。

在与一些乡镇干部交流时，记者明显能感受到他们的无奈。一位山区镇长对记者说，乡镇权力、财力、人力都极为有限，有时开展工作真的左右为难、无所适从。举例来说，要确保道路交通安全，乡镇没有交警没有执法权，老百姓超载、三轮车载客，劝导难以起作用。拆违控违，需要协调方方面关系。在要求限期限量完成的情况下，如果不“踩红线”，不打擦边球，怎么可能完成任务？

如果不管部署什么工作，都让基层签个责任状，其实也是一种形式主义。责任状泛滥，本质是一些上级以行政权力压制下级，根源在于绩效考核制度不完善、不科学，暴露出的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。有基层干部甚至说，一个地方责任状的多少，往往是当地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存量的直接反映。这种简单粗暴的管理考核机制早已不适应新的形势，必须尽快改革。

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。乡镇处在政权体系的最末梢，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最基层的责任主体。落实好从中央到省市县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对乡镇来说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，一味将责任“包袱”压在乡镇干部身上，却无助于落实责任，可能还会适得其反。要给乡镇干部松绑减负，当务之急是去一去责任状的“库存”，挤一挤这种落后行政手段的“水分”。另外，还要在责任分担、上下联动、科学考核方面，再多想想办法，千万别再动不动就以责任状落实责任了。

党员干部要把手中的权力与为民服务的责任挂钩，而不是享受；把身居的职位看成是为民服务的岗位，而不是待遇

《大唐新语》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：贞观年间，名臣岑文本被唐太宗升任中书令后，回到家里却满脸忧虑。面对母亲的疑问，他说：“我没有功勋，皇上也没有旧交，获得太大的宠幸，职位高责任重，这是古人所忌的，所以感到忧虑。”事实上，负责起草文书的岑文本才能卓著且兢兢业业，受到赏识和重用理所应当，但他却认为自己贡献不足，害怕担当不起中书令重任而忧心忡忡。

岑文本不因“位高”而放肆，不因“权重”而暴戾，升官之后不以为喜，反以为忧，是因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更大的权力，而是更大的责任。岑文本这种“位高而忧”的权力观，值得深思和借鉴。

“位高而忧”恪守的是对权力的敬畏之心。权力是一把双刃剑，用得好好可以为民造福；如果“剑走偏锋”，就会伤人伤己甚至祸国殃民。

党员干部更要时刻牢记“高位”“重权”都是党和人民给予的，要把手中的权力与为民服务的责任挂钩，而不是享受；把身居的职位看成是为民服务的岗位，而不是待遇。谷文昌率领东山县群众苦战十几载，治服了“神仙都难治”的风沙。为了缅怀他，“先祭谷公，再祭祖宗”，成为东山县百姓多年的习俗。相比之下，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利用手中权力，为他人大开方便之门，攫取巨额利益，最终沦为历史的罪人。

“位高而忧”深怀的是为民的公仆情怀。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；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焦裕禄、孔繁森、沈国洛式的好干部之所以能够刻进群众的心灵深处，正是因为他们对群众满怀赤子之心。

党员干部的作为，都在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秤上。老百姓在干部心中的位置有多重，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位置就有多重。党员干部身居“高位”、手握“重权”，更应返璞归真，牢记入党誓词时的“初心”，自觉摆正公仆位置，不以“父母官”自居而凌驾于群众之上，而要始终视群众为“父母”，牵挂其冷暖安危，吃百家饭、串百家门、谈百家话、解百家愁，真正恪守为民之责，多办利民之事。

“位高而忧”诠释的是为官的担当本色。“大事难事看担当，顺风逆境看襟怀”。担当是党员干部的“身份证”，要自觉把担当刻进灵魂，把愿担当、敢担当、善担当作为从政的根本去践行。

“最美村书记”毛丰美上任伊始，就意识到凭借大梨树村“八山半水一分田”的自然资质，不下狠心、恒心根本干不出成效。于是，毛丰美带领党员干部率先步入荒山，凭着一把镐、一把锹、一顶破草帽，干就是了40天。“毛书记为谁辛苦为谁忙”的叩问，打消了村民的畏难情绪，由此展开了一场全村总动员的治山治水攻坚战，而金秋飘香的万亩果园也彻底断除了大梨树村的“穷根”。

面对当前复杂形势，党员干部要铆足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的劲头，善解难题、善克难关，不断砥砺敢于担当的品格，提升善于担当的本领，夯实勇于担当的底气。

“悲情求助”的痛点

要靠现代慈善治愈

房清江

1月11日下午2点多，北京复兴门地铁站A口附近，一名男子脱光衣服，只穿一条内裤跪在地上，举着一根木棍求路人打他屁股，打一棍10元。这是一场炒作？日前，记者联系到这位男子。他表示，自己的孩子确实患有眼疾，想通过这种方式筹医药费。目前他带患儿已回老家，为孩子筹到钱后再进京看病。（1月15日《法制晚报》）

从传播效果上看，一些个体求助时采用“悲情”方式，确实更能引起媒体关注；通过媒体关注，进而引起广泛的社会关心和同情，从而能够在短时间内摆脱困境。从这个角度上讲，这种方式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。但是，在习惯了各种炒作的语境下，冬天裸露上身“有伤打屁股”，为孩子筹治疗费用，即使情况真实，也难免“悲情秀”的嫌疑。

同情是公益的原始动力，但仅仅基于一时悲悯的情感，靠煽情与眼泪催出来的公益捐赠，再通过媒体进行放大，终究是临时的而非可持续的，能够帮助到的对象只能是极少数。其实，公益更是一种社会责任，对弱势与身处困境地的人们，给予普遍而经常性的关心与帮助，让他们享有相对公平的救助权利。这需要公益慈善走向组织化、社会化之路，成为政府保障兜底之外的有益补充，让公民的捐赠成为常态，而不再只是针对具体对象的直接赠予。

个体求助对媒体的依赖程度，其实也是现代公益慈善成熟度的一个标志。越依赖媒体，越证明公益慈善的组织化、社会化水平越需要提高。近些年，一些网络募捐事件越来越呈现炒作倾向，背后策划的痕迹越发明显。比如，“跪爬救女”“父亲卖卫生巾救女”等事件，都在演绎着“比惨”的传播逻辑。

然而，如果在传播上剑走偏锋，过于依赖媒体对事件进行放大，则有可能导致道德准则的迷失和事情本质的失焦，如去年引发舆论关注的“偷鸡腿救女”个案。而与之相反的则是，刘燕的“病室友”王玉琴，一本正经地通过微信拟众筹善款20万元，众筹期结束后，也仅仅只筹到2万元。对比之下，高下立判，折射出社会公益慈善发展的瓶颈。

过于依赖媒体，不仅导致求助行为的变形，而且还会裂变社会心态。如，“偷鸡腿救女”事件深陷道德争议的漩涡，有人说“她不就是偷了一个鸡腿吗”。非道德的行为为换来自利的结果，还有定义的豁免权，如何让人心理平衡不去效仿？此外，打悲情牌来吸引社会的怜悯，也容易放大网络直播的软肋，许多炒作出位的求助捐赠，都掉入了骗捐的争议陷阱。

求助不能总靠媒体来救济，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，构建现代公益慈善理念与文化，通过政策引导、税费优惠等，加快社会公益组织、公益基金的培育与发展，促进社会公益慈善版本升级；不断完善慈善法治体系，提高公益慈善的透明度，提升公信力，增强社会参与慈善捐赠的积极性，做大慈善公益蛋糕，让更多人在慈善公益机制内得到救济。比如，孩子得了严重的眼疾，做家长的能够在第一时间想到政府和专门的慈善基金来满足救助，而非牺牲尊严形同乞讨。

『位高而忧』看担当

王鑫鑫



我给我爸当翻译

张典标

前一阵子，我爸来北京看病。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，上一次还是5年前送我上大学的时候。他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农村，平时说的也是方言，几乎不会说普通话。于是，我在照顾他的同时，也在他和医生之间充当翻译。

几天前，刚做完手术不久，我爸躺在病床上要我向医生传达他的感受：“我感觉后背嘛呢嘛呢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”

“嘛呢嘛呢？什么意思？”我很困惑。尽管从小生活在农村，我依然不解其意。

“就是嘛呢嘛呢的！”我爸有点着急，又重复了一遍。

“是冷？是热？还是麻？”我试图用普通话的日常表达来替换他的方言表达。

“都不是。唉，就是后背的皮肤嘛呢嘛呢的啊！”我爸越发着急了，看起来很不享受。

“那您还在其他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词？”我想通过具体情境来猜测这个词的意思。

我爸告诉我，当一个人被骂的时候，就会说他后背感觉嘛呢嘛呢的。被骂？嘛呢嘛呢？皮肤？我听完更是一头雾水。

几次猜测之后，我依然没能翻译出我爸的意思。医生也犯了难，只能根据经验，建议多给我爸翻身和按摩，“嘛呢嘛呢”的症状才得以缓解。

类似情况，我不是首次遇到了。在平时的电话中，向家里谈起自己近况的时候，我将普通话翻译为方言也经常短路。难以清楚翻译的不仅仅是那些复杂语句，甚至还包括实习、出差、写论文等简单词汇。为了避免反复解释，我经常用“挺好的”来代替，或者干脆避而不谈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老家的方言里是有对应词语的。

现在想来，出现这种情况，当然有语言本身的问题。比如在闽南语中，关于“吃”，就竟然有六七种不同的表达。

不过，我觉得，更深层的原因可能与自我否定式的教育理念有关。小时候，父母总对我说：“当农民没出息，你不好好学习，将来只能和我们一样。”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，随着城乡差距的放大和城市生活经历的不断积累，我的这种观念也在逐渐加强，出现翻译短路也就不奇怪了。

“审批马拉松”是与简政放权唱反调

冯海宁

简政放权应高度重视企业和公众的实际需求，既不能凭自我感觉，也不能关门决策，即按“需”简政放权，做有用功

展也将产生不利影响。

报道显示，造成审批慢的原因有两个：一是手续繁琐，耗时太长；二是牵涉面广、涉及部门多，“层层过堂”会审。可见，这是在简政放权的主流“唱反调”——简政放权，就是要精简束缚市场主体的“无形枷锁”和错架在政府身上的“有形之手”。而这个案例折射出的“无形枷锁”与“有形之手”都太多。

可能在相关审批部门看来，之所以参与用地审批是职责所在，之所以审批时间长是为了谨慎。但根本上讲，还是因为该减的“政”没有减，该放的“权”没有放。当地有关方面既没有真正领会中央简政放权的改革精神，也没有积极改革和完善当地长期以来存在的审批模式，究其原因大概是担

心部门利益受损。

要改变这种“马拉松式”审批，首先需要从制度规定入手。当地国土部门负责人表示，“报批出让需要哪些材料，要走哪些程序，相关规定框得很严。”这提示我们，落实简政放权需要先从制度入手，只有在制度上精简审批程序和所需材料，相关审批部门才能提高审批效率。

其次，需要从体制机制入手。多部门介入用地事项审批，必然会造成审批慢。能否通过系统研究和考量，适当减少审批部门，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之一。能否在符合相关制度要求的基础上，把多部门分别审批变为集中统一审批，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之二。另外，把审批、管理职能进行明晰划

分，从而提高审批效率，同样也值得有关方面考虑。

其三，需要从时间入手。减少审批程序、审批部门，就能提高审批效率吗？其实也未必，不排除某些部门因为害怕出问题被追责，会反复研究，造成拖延时间。还有一些领导因事务繁忙等造成审批延迟。要提高效率必须把“限期”作为鞭子，如果规定时间内未完成审批应问责。

另外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，简政放权应高度重视企业和公众的实际需求，既不能凭自我感觉，也不能关门决策，即按“需”简政放权，做有用功。也就是说，简政放权不能“有数量无质量”。而让企业和公众来评价简政放权效果，评介结果作为政绩考核依据，相信也能鞭策简政放权真正落地。

希望上述案例能引起我们更多思考，反思现实中还有哪些背离简政放权的现象，从而不断完善和深化简政放权改革。



记者最近在广西某市开发区采访了解到，开发区管委会在已经获得自治区单列用地指标的情况下，将用于不同项目的10宗土地打包办理报批出让手续，前后耗时竟长达10个半月，漫漫“审批长征路”造成部分项目进度滞后，落地困难。（1月16日《半月谈》）

众所周知，近年来我国大力规范和改进行政审批，从中央到地方不断简政放权，成效明显，获得公众和社会舆论的高度肯定。然而从这个耗时10个半月还有不少手续没办下来的案例来看，一些地方并没有真正做到中央所要求的简政放权。而“马拉松式”审批，不仅耗费大量行政资源，还会给部分企业造成不小损失，对地方经济发